

中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 测度及差异分析^①

叶 背 谢 迟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

研究目标：测度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剖析两者现状与差异。**研究方法：**构造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指标，问卷测度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相关系数为 0.472，但差异也较为明显。数值差异方面，民生获得感总体明显高于民生满意度，民生获得感大于、等于、小于满意度的样本数分别占总体样本的 58.34%、2.3%、39.36%，且两者数值正负等级也差别明显；特征差异方面，民生获得感仅在不同的收入与年龄群体中有明显差异，而民生满意度在不同的年龄、居住环境、就业状态、收入、文化程度群体中都存在明显差异。第二，导致两者数值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民生预期在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之间有负向中介调节作用、预期值越高，民生获得感提高对满意度的促进作用越弱；导致不同的年龄与收入群体均在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中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是年龄与收入能够同时影响到民生获得感、满意度与预期，其他个体因素则没有这样全面的影响。**研究创新：**测度与分析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的差异，揭示造成差异的原因。**研究价值：**有助于协同把握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为增强民生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民生获得感 民生满意度 测度 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及文献简述

量化居民获得感与满意度是衡量区域发展质量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度量指标，有别于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等客观指标，居民获得感与满意度水平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为获得感与满意度的提高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成果的丰富，更体现着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与满意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居民获得感与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提升发展潜力，充分体现了共享发展的内涵，是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应有之义。

民生满意度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目前主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和西南财经大学民生指数研究中心直接涉及民生满意度量化，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和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

^①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服务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实证研究”(71373212) 和“绿色消费的内涵刻画、指数测度及发展机制研究”(71873107) 的资助。

重点在民生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将民生满意度分为生活满意度与民生整体满意度两个部分，民生整体满意度又细化为12个民生项目的满意度。西南财经大学民生指数研究中心则有两套关于民生满意度量化的体系，一是早期在四川民生满意度调查中使用的民生满意度体系，包括居民生计、公共服务、民生环境以及文化消费等四个方面（任栋等，2015）；二是2015年发布的全国省会城市民生满意度指数，该指数进一步对民生指数体系进行了优化，新体系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宜居环境、公共管理以及社会参与等六个方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民生指数研发中心，2017）。同时，还有一些涉及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的量化研究，其实质属于民生满意度研究的一个部分。民生就是居民的生活与生计，主要包括居民生存与生活状态两个方面，居民生活满意度自然是民生满意度的一个部分。另外，公共服务是民生问题中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民生改善的重要推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2011）基于《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改善民生的表述，认为“政府是改善民生重要主体之一，其主导作用非常突出，希望突出对地方政府‘服务’和‘管理’两个职能的评价，借以监测、督促各地政府在促进民生保障与发展实践中不断提升水平”。因此，其民生指标体系包括民生发展质量、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个重要方面。进一步，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2011）的民生指标体系也以公共服务为主，涵盖公共财政与民生投入、分配与公平、就业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人居环境与环境保护、住房保障各个方面。此外，各国的消费者满意度指数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ACSI（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广泛被其他满意度指数研究所借鉴，其基于感知质量、顾客期望与感知价值的构造原理在不少研究和论著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重点关注的是其由问卷问题到指数的过程。根据Claes Fornell和刘金兰编著的《顾客满意度与ACSI》一书中举例的问卷问题显示，ACSI关于某一产品的满意度量化中，大致包括15个问题，涉及感知质量、顾客期望、感知价值、总体满意度、顾客抱怨以及顾客忠诚。其中，总体满意度至少包括对某类产品的总体满意情况、同预期的失验（低于或高于期望的程度）、与理想状态的差异情况。

我国的民生质量低于标杆国家，而且发展速度缓慢（宋明顺等，201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的调查结果，我国城乡居民对社会治安、社会保障、教育的满意度较高，对就业、收入、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较低。2015年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较上一年有所下降，特别是对脆弱群体民生的影响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另外，Brockmann等（2009）利用1990~2000年的WVS数据发现，尽管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却下降。可以说，提高民生满意度比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因此，在民生满意度指数构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民生满意度的个性特征分析，去探究提升民生的路径，在政策取向上重视各类群体的重点（周绍杰等，201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民生指数研发中心，2017）。周绍杰等（2015）利用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优先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才可能使居民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而单纯地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或地方财政自主性并不能有效增加居民对地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只有落实财政问责机制，强化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才能有效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陈世香和谢秋山，2014）。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在推动民生指数研究发展及明确中国民生提升路径方面

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关注基于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有机协同与差异。获得感提高是满意度提升的基础，只有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有切实获得，才能使其满意度更好地提高，满意度提高是提高获得感的目的。“获得感”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人们基于实际获得而产生满足和幸福等积极心理感受。但“获得感”不仅强调具体“绝对获得”的感觉，同时，还由“相对获得感”所决定（曹现强和李炼，2017）。例如，收入差距能够影响人的幸福感（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并且会一定程度降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学术界对“获得感”的指标测量还不多见。根据负性的剥夺感是基于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的比较结果并由此激发出“怨愤”的负面心理感受和情绪（Gurr, 1970），黄艳敏等（2017）认为作为负性得失感知反面的获得感，也可以建立在以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比较基础上，并以个体实际收入实现或超出其公平收入期待作为衡量其对自我获得的满足度。唐有财等（2017）从社会支持角度去分析获得感时，认为影响农民工获得感多寡和强弱的最直接因素是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否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帮助，并以“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以下单位或组织对您的帮助程度”这一问题测度获得感。王斯敏和张进中（2015）认为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应至少包含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这三个指标。总的来说，“获得感”更加贴近民生、体贴民意，并使人民得到的利好有了指标衡量的可能，并能够有效转化为人们的主观满意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在民生工作中，满意度是幸福感的重要体现，直接反映着民生提升的根本目的，获得感与满意度的增强是人民美好民生需要不断满足的必然要求。

二、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测度

1.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概念异同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是获得感与满意度在民生领域的运用，在已有文献中获得感被定义为社会感知的一种特定类型，是基于个体经历与现实行为而成（唐有财和符平，2017）。获得感在于实在得到与真切满足，是个人或群体将生理健康、心理状态、个人信仰与客观环境结合的主观体验之一（刘长庚和张磊，2018）。民生获得感就是人民群众对民生改善成效的一种感知。进一步，在最初消费者行为学中的定义，消费者满意度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消费的满意程度的一种度量，是当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喜悦感。那么民生满意度则是指人民群众对政府提供的民生品及服务满意程度的一种度量。

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都是对民生发展的一种主观评价，两者的相同点为都具有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双重性质。首先，民生获得感来源于民生成效水平，改善的客观情况决定着获得感的基础，这是其客观性，同时获得感受个体经历的影响，表现出主观性。其次，民生满意度作为民生需要满足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由于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与欲望、意愿、满意等

^① 习近平：《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N]，《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

心理判断相关，容易在表象上体现为主观性。但在实质中，满意度又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因为需要及其满足手段源于社会的生产创造，在其基础上的度量必然存在客观性。需要满足的客观性与需要及满足手段的客观性直接相关，来源于需要是由生产所创造的本性。马克思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① 进一步，恩格斯指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② 这里清晰地表明了需要及其满足手段来源于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产生着新的需要。而且，由于“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③ 也就是说人们表现出来的需要满足的度量是基于社会尺度的一种展现。所以，民生满意度也表现出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

同时，两者的差异表现为决定因素与过程的不同。按照现代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满意度取决于实际获得的效用与之前的个人期望，实际获得的效用体现着客观性，个人期望体现着主观性：消费者对购买的满意度程度取决于最初的期望水平和相对于这些期望的实际感知水平^④。当期望低于实际功效时，表现为满意；当期望等于实际功效时，表现为非满意；当期望高于实际功效时，则表现为不满意。也就是说，消费者（顾客）主观满意度高低通常源于实际效用与心理预期效用的差异。假设消费者（顾客）的主观满意度估值的形成一个黑箱过程，他通过自身的预期和实际获取水平，在心理黑箱过程形成一个对外表达的主观满意度。因此，民生满意度的表达式形成如下形式：

$$PS_i = f(h_i - e_i) \quad (1)$$

在式（1）中， PS_i 为 i 居民表现出来的满意度， h_i 为 i 居民获得的实际满意程度感知水平， e_i 为 i 居民预期的满意水平，且函数 $f(X)$ 为增函数。按照此式，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因受到预期的影响，居民的实际获得感并不能够有效转化为满意度，当居民实际感知水平提高时，其对满意度的影响既取决于其本身的水平，也取决于其相对于预期的水平。而且，由于预期的形成与个体特征密切相关，导致满意度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要强于获得感，即满意度的主观性要强于获得感，而获得感的客观性要强于满意度。

2.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测度方法

(1) 基本思路。在国内主要的四个民生状态评价的研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立足于民生的基本内容，从不同的民生项目去评价满意程度。国家统计局编制发布的民生指数着眼于与民生质量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客观变化衡量民生发展的质量。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采取宏微结合的评价模式，在民生基础衡量上再加入与微观主体直接相关的收入消费、居住出行、文化教育、安全健康等二级指标。西南财经大学民生指数研发中心采取主观与客观结合的评价模式，指标体系中既包含反映居民主观评价与期待的指标，也包括反映民生状况的物质条件等客观要件。采用民生内容评价，民生项目的划分决定着总体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5。

^④ 翟金斯、马瑟斯博：《消费者行为学》(第12版) [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生满意度的科学性，民生项目要处于动态更新之中，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的民生调查内容由最初的9个到2014年的12个民生项目（韩俊，2014），又如2015年减少了公款吃喝治理和惩治贪腐两个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8）。采用影响因素度量，指标体系的完备性有一定的挑战，因为影响因素比较广泛，甚至可能存在理论上还没有被发现的因素。采用宏微结合或是主观客观结合，重点是更为全面地评价民生工作进展与民生事业发展。

综合上述认识并结合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调查的经验，本文认为民生满意度还是以人民群众的主观满意程度评价为准绳，在指标体系中不包括现状客观指标。因为按照当前量化体系研究的分类看，量化体系可分为现状量化、潜力量化和竞争力量化三个方面。现状量化体系的指标选择要求贴近现实的现状指标，表明实现了怎样的发展；潜力量化体系侧重于反映事物相关的影响因素指标，表明能够实现怎样的发展；竞争力量化体系则是两者的有机契合，既要看发展的现状，也要考虑可能实现怎样的发展（毛中根等，2018）。民生满意度属于现状评价，目的在于对微观主体作主观感受的切实反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中，就将民生主观指数作为民生满意度指数，民生客观指数用于度量民生发展水平，两个指数合起来为民生指数。

进一步，指标体系的所含内容要回归民生的本身含义。所谓民生就是民之生活、民之生计，从居民的生活场景去划分民之生活能够保证民生范围的完备性，本文将居民的生活场景划分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生态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五个场景，涵盖物质、精神与生态三个方面。每个场景分别设计一级指标，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生活环境以及公共服务五个方面。接下来，将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层次细化，例如将文化教育满意度又细化为教育消费满意度、旅游消费满意度、文化娱乐满意度以及体育保健满意度。进一步，如文化娱乐满意度再细化为文娱时间、文娱场所、文娱花费三个满意度方面。在这里需要重点就民生获得感测度做进一步的讨论，相关支持文献比较少。在前文的文献梳理中，国内研究者突出获得感的潜变量属性，说明其难以直接观测，要通过其他相关变量予以间接替代。但同时，在ACSI中也采取对实际感知质量直接评分的方式，也就是说获得感是可以直接评价的，而不一定要用间接指标来代替。进一步，考虑到可操作性与前期预调研的情况，居民大体能够对民生成效做一个感受评价。但具体到细化项目，却难以像满意度一样做出较为清晰的评价。因此，本文对于民生获得感是一个整体的评价，民生满意度是一个指标体系化的评价，详见表1。

(2) 量化方式。由于采取主观评价的模式，本文的数据获取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在问卷调查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整体民生评价采取对现状、改善以及预期三个维度的评价，对居民民生项目采取单一维度评价。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采取既设置实际感知，也设置与顾客期望有关的显变量，还在总体满意度的调查中考虑同预期的失验（Disconfirmation，即消费前形成的期望同实际绩效比较产生不一致的结果）以及理想状态。进一步，比较美国顾客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具体问题与民生领域的具体调查项目，发现顾客满意度调查问卷的量化方式是难以运用到民生领域。举例来说，针对汽车的顾客满意度，调查问卷中会请被调查者回忆在购买新车之前的质量总体期望、期望新车对需求的满足程度、购车前预期出问题等情况，这就不适用于具体民生领域。首先，民生品及服务缺乏标准化的实物载体与非具体性，没有如一般实物商品的标准化生产，让居民在内心评价时，也就缺少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这类需求会更多地打上个人偏好和目标。其次，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的载体依赖

性很强。相同的公共服务由于不同的载体，会带来差异巨大的体验感受，有时候仅因个别工作人员的态度，就影响了获得感与满意度且作用时间较长。最后，民生满意度的区域差异性较强。由于民生品及服务非市场性，其在区域范围内有着集体消费品的属性（西方经济学中称俱乐部物品），由于评价者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选择，其评价往往是长期感受的固化。因此，在具体民生项目评价中，人民群众对当地民生成效的评价固化和个体随机性增强；居民也很难预估出其对民生品及服务的期望值及可能的预期变化，导致难以通过直接询问形成对其预期值的量化。而且，由于区域民生品及服务无法通过市场选择，具有区域供给垄断性，普通居民是难以通过比较其他区域的情况做成预期的判断，也就是存着社会比较的障碍性。基于此，本文只采用现状评价的维度而未对改善预期评价，由被调查者针对具体民生问题在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不清楚中进行选择，并分别赋值为1、2、3、4、5、6。

表1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民生满意度	经济生活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满意度
		居住地物价	物价水平满意度
		家庭住房	家庭住房满意度
	社会保障	就业	就业状况满意度；休假情况满意度
		医疗	医疗质量满意度；医疗费用满意度
			医疗报销比例满意度
		养老	社保缴费满意度；保险金领取满意度
	文化教育	教育消费	教育质量满意度
		旅游消费	景点满意度；出行满意度
		健身休闲	体育场所满意度；体育设施满意度
		文化娱乐	文娱时间满意度；文娱场所满意度；文娱花费满意度
	生活环境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满意度
		饮水质量	饮水质量满意度
		居住环境	宜居环境满意度
		交通状况	交通便捷满意度；公共交通满意度
	公共事务	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满意度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满意度
		政府办事	政府办事效率满意度；社保服务便利满意度
		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满意度
		社区参与	公共事务参与满意度
		邻里关系	群众纠纷解决满意度
民生获得感			对民生成效的评价

3.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现状分析

(1) 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本文采用的数据系西南财经大学民生指数研究中心2014年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次调查范围为全国各省份行政机构所在地即省会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台北市除外），计27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以下均统称为省会城市），即31个省会城市。调查对象为省会城市常住居民，凡在调查区域内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中国籍住户即为该次调查的对象。

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为主，配额抽样为辅”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调查整体的抽样方案为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第一阶段采取分层抽样从各省会城市中抽取若干个街道，第二阶段从街道中采用距抽样抽取住户，每个抽样总体最低样本量不低于385个基本调查单位（户），总共抽取样本容量为11000户，实际获取有效调查样本9308份。基于实证分析需要，本文保持了三级指标数量的一致性，即只取表1中所有三级指标均为有效回答的样本。（在一般只涉及指标的量化中，三级指标可以是各自有效样本数值的计算，比如文化娱乐满意度指标评价的有效样本为9109份，饮水质量满意度评价的有效样本为8794份），共得到可进行微观研究的样本4256个，相关描述性统计见表2^①。数据显示，2014年居民民生满意度均值为3.080（满意度为五维，1为很不满意，5为很满意度），民生获得感（同满意度）均值为3.216，两者相差0.136，两者存在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472。

表2 民生满意度与民生获得感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系数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民生满意度	4256	3.080	0.484	1.000	4.742
民生获得感	4256	3.216	0.805	1.000	5.000
Spearman 相关系数	0.472**				

注：***、**、* 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性水平。

(2) 评价的现状分析。进一步，将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进行个性特征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但由于民生获得感在年龄、就业状态、文化程度因子中未能通过同方差检验，因此对这三个分类再采取非假定方差同质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第一，民生满意度在不同年龄、居住环境、就业状态、收入、文化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中F检验显著，表明其在这些因子中存在明显差别，而在不同职业与性别中没有明显差别。其中，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收入越高满意度越高，居住在卫星城市且有收入不工作的群体满意度最高。第二，民生获得感在收入因子下存在明显差别，收入越高民生获得感越强（见表3）。进一步，多重比较也显示：在年龄中，各个年龄段之间还是存在一定显著差异，其中30~39岁与其他年龄段差异最为明显，只与40~49岁年龄段不存在明显差异，50~59岁只与30~39岁存在差异；在文化程度中，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与大专文化程度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状态中，主要是有收入无工作群体同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别，而其他就业状态群体之间没有明显

^① 调整样本量后，数据量不满足每个随机抽样至少300个样本的要求，数据值只能说明调查数据情况，不用于总体推断。

表3 民生满意度与民生获得感的个体特征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 量	分 类	民生满意度		民生获得感	
		平均值	F 检验	平均值	F 检验
年龄	16~29岁	2.967	21.129*	3.124	—
	30~39岁	2.905		3.004	
	40~49岁	2.975		3.096	
	50~59岁	3.028		3.2	
	60~69岁	3.157		3.3	
	70~79岁	3.276		3.419	
居住环境	城市中心	2.991	8.113*	3.124	0.465
	城乡接合部	2.946		3.098	
	城市卫星城	3.088		3.116	
就业状态	全日	2.943	36.441*	3.079	—
	非全日	2.965		3.083	
	有收入无工作	3.153		3.283	
	失业	2.919		3.076	
收入	3万元以下	2.885	14.471*	3.023	5.57*
	3万~6万元	2.911		3.059	
	6万~10万元	2.999		3.109	
	10万~20万元	3.033		3.176	
	20万~30万元	3.061		3.197	
	30万~50万元	3.197		3.361	
	50万~100万元	3.133		3.308	
	100万元以上	3.266		3.5	
职业	机关及事业单位	2.963	0.484	3.116	0.281
	企业	2.988		3.134	
	个人经营	2.967		3.072	
	进城务工	2.967		3.063	
	自由职业	3.108		3.115	
	离退休	2.995		3.202	
	失业/待岗	2.986		3.064	
	在校学生	2.956		3.095	
	其他	2.991		3.05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174	13.953**	3.308	—
	初中	3.052		3.116	
	高中/中专	2.987		3.125	
	大专	2.902		3.059	
	本科	2.961		3.129	
	硕十研究生及以上	3.009		3.056	
性别	女	2.971	1.567	3.103	1.119
	男	2.99		3.129	

注：本表中列出F检验值的均是符合同方差检验要求的，一则表示不符合同方差检验要求。***、**、*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差别（见表4）。综合来看，民生满意度的个体特征最为明显，在不同年龄、居住环境、就业状态、收入、文化程度群体中均存在明显差别；民生获得感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存在明显差别，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明显差别。

表4 民生获得感的多重比较

年 龄		文化程度		就 业 状 态	
分 类	平均差异	分 类	平均差异	分 类	平均差异
2.00	3.00	0.12015*	1.00	2.00	0.19126
	4.00	0.02747		3.00	0.18246
	5.00	-0.07605		4.00	0.24860*
	6.00	-0.17569*		5.00	0.17866
	7.00	-0.29541*		6.00	0.25128
	2.00	-0.12015*		1.00	-0.19126
3.00	4.00	-0.09268	2.00	3.00	-0.00881
	5.00	-0.19620*		4.00	0.05734
	6.00	-0.29584*		5.00	-0.01260
	7.00	-0.41555*		6.00	0.06002
	2.00	-0.02747		1.00	-0.18246
	3.00	0.09268		2.00	0.00881
4.00	5.00	-0.10352	3.00	4.00	0.06615
	6.00	-0.20316*		5.00	-0.00380
	7.00	-0.32287*		6.00	0.06883
	2.00	0.07605		1.00	-0.24860*
	3.00	0.19620*		2.00	-0.05734
	4.00	0.10352		3.00	-0.06615
5.00	6.00	-0.09964	4.00	5.00	-0.06994
	7.00	-0.21935		6.00	0.00268
	2.00	0.17569*		1.00	-0.17866
	3.00	0.29584*		2.00	0.01260
	4.00	0.20316*		3.00	0.00380
	5.00	0.09964		4.00	0.06994
6.00	7.00	-0.11972	5.00	6.00	0.07262
	2.00	0.29541*		1.00	-0.25128
	3.00	0.41555*		2.00	-0.06002
	4.00	0.32287*		3.00	-0.06883
	5.00	0.21935		4.00	-0.00268
	6.00	0.11972		5.00	-0.07262

注：年龄中分类标签2.00~7.00分别代表16~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和70~79岁；文化程度中分类标签1.00~6.00分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就业状态中分类标签1.00~4.00分别代表全日、非全日、有收入无工作和失业。***、**、*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

三、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1. 基本差异的描述性分析

通过现状分析,可以发现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虽然存在较高关联,但两者无论是在平均数值上还是个体特征上都存在一定差异。接下来,本文用两配对样本检验方法判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符号检验是利用观察两个样本差值所得的符号判断其总体是否具有差异,若正负号个数差异大,则两个样本所来自的总体存在明显差异。反之,则不具明显差异。等级检验是符号检验的拓展,不但观察两个样本差值所得的符号,还依据正负值的等级判断两个样本所来自的总体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若没有明显差异,则正负值的个数与等级大致相等。反之,则具有明显差异。

根据表5的基本情况描述以及符号检验和等级检验的Z统计量结果,都表明民生满意度与民生获得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等值的数目为101个样本,仅占全样本数量的2.3%;民生获得感大于民生满意度的数目为2483个样本,占全样本的58.34%,是民生获得感小于民生满意度样本数的1.49倍。且两者的平均等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民生获得感大于民生满意度的绝对值均值是其小于民生满意度绝对值均值的1.11倍。这既表明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别,也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民生获得感并未切实有效转为民生满意度。

表5 民生满意度与民生感的差异情况

符号检验	N		均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Z统计量
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	负差	1672	-0.53	-0.0323	-2.709	-12.566***
	正差	2483	0.59	4.483	0.0323	
	等值	101				
	总计	4256				
等级检验	N		平均等级	等级总和	Z统计量	
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	负等级	1672 ^a	1987.48	3323065		-12.855***
	正等级	2483 ^b	2138.95	5311025		
	等值	101 ^c				
	总计	4256				

a. 成效获得感<满意度

b. 成效获得感>满意度

c. 成效获得感=满意度

注:同表2。

进一步,将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正负值在个体特征上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正负值分布在个体特征上并不非常有明显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维度,部分体现在教育程度维度。在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0的样本中,16~29岁占比34.15%,高于对应的负值占比1.85个百分点;30~39岁占比24.12%,低于对应的负值占比1.24个百分点;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占比13.47%,低于对应的负值占比2.97个百分点;文化程度为大专的占比21.48%,高于对应的负值占比1.92个百分点;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占比31.80%,高于对应的负值占比2.29个百分点,详见表6。基本可以认为,越是文化程度高就越可能对民生获得感给出一个相对高值,而对民生满意度给出一个低值。

表 6 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正负值的分布情况

变 量	分 类	民生满意度	民生获得感	差 值
		占比 (%)	占比 (%)	百分点 (个)
年龄	16~29 岁	34.15	32.30	1.85
	30~39 岁	24.12	25.36	-1.24
	40~49 岁	20.66	21.05	-0.39
	50~59 岁	12.78	11.90	0.88
	60~69 岁	6.00	7.24	-1.24
	70~79 岁	2.30	2.15	0.15
居住环境	城市中心	63.06	62.92	0.14
	城乡接合部	33.70	32.27	1.43
	城市卫星城	3.24	4.80	-1.56
就业状态	全日	67.20	67.57	-0.37
	非全日	13.27	12.04	1.23
	有收入无工作	15.64	16.70	-1.06
	失业	3.88	3.69	0.19
收入	3 万元以下	13.13	13.00	0.13
	3 万~6 万元	25.54	26.25	-0.71
	6 万~10 万元	28.82	28.42	0.40
	10 万~20 万元	21.95	21.34	0.61
	20 万~30 万元	6.14	6.35	-0.21
	30 万~50 万元	2.75	3.12	-0.37
	50 万~100 万元	1.29	1.14	0.15
	100 万元以上	0.36	0.36	0.00
职业	机关及事业单位	16.87	15.78	1.09
	企业	34.68	34.03	0.65
	个人经营	10.00	13.04	-3.04
	进城务工	3.02	3.05	-0.03
	自由职业	6.32	5.62	0.70
	离退休	9.18	10.11	-0.93
	失业/待岗	9.14	8.13	1.01
	在校学生	8.30	7.72	0.58
教育程度	其他	2.50	2.51	-0.01
	小学及以下	4.20	4.38	-0.18
	初中	13.47	16.44	-2.97
	高中/中专	25.04	24.77	0.27
	大专	21.48	19.56	1.92
	本科	31.80	29.51	2.29
性别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4.00	5.34	-1.34
	女	49.16	49.16	0.00
	男	50.83	50.83	0.00

最后,本文利用非参的相关系数计算也发现,年龄同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差值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年龄越大差异值就越高,文化程度在负值中越高差异值就越小,而其他个性特征并不明显,详见表7。可能的原因是越是年轻人,越是文化程度大的人,其对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评价就越客观理性。

表7 个体特征和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差异的相关系数

变 量	相关系数	
	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	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
年龄	0.066**	-0.49*
居住环境	0.005	0.031
就业状态	0.042	-0.022
收入	-0.002	0.039
职业	0.001	-0.13
教育程度	-0.039	0.08*
家庭成员数	0.002	-0.009
性别	0.028	-0.029

注:同表2。

2. 差异原因的实证分析

(1) 基本模型。在前文已经指出预期是造成获得感与满意度差异的重要原因,根据式(1),并结合周绍杰等(2015)所使用的满意度激励模型,构造计量方程为:

$$PS_i = \lambda c_i + \alpha_1 h_i + \alpha_2 e_i + \alpha_3 h_i e_i + \beta_i \sum X_i + \epsilon_i \quad (2)$$

其中, PS_i 为居民的民生满意度, h_i 为居民对民生成效的获得感, e_i 为居民的民生期望, X_i 为可能影响民生满意度的控制变量,包括自身幸福感、年龄、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数、就业情况、收入水平、职业、教育程度、性别以及所在城市, ϵ_i 为随机扰动项。以上变量除民生预期外,都在问卷中有相应的问题予以对应。在前文测度部分已经就为什么在民生调查中未进行预期做了说明,因此在实证中需要进一步考虑通过间接的方式量化预期。

(2) 预期的估计与替代。虽然,居民(消费者)无法准确有效表达其对民生品及服务的预期,但在对居民进行主观满意度调查时其内心有一个结合预期处理的潜在模型。也就是说虽然无法写出式(1)的具体模型形式,但可以认为居民在进行选择时,内心中存在一个没有具体表达形式的潜在模型: $y_i^* = E(y_i | X) + u_i = X\beta + u_i$, 是一个多元有序选择形式:

$$y_i = \begin{cases} 1 & \text{if } y_i^* < \gamma_1 \\ 2 & \text{if } \gamma_1 < y_i^* \leq \gamma_2 \\ 3 & \text{if } \gamma_2 < y_i^* \leq \gamma_3 \\ 4 & \text{if } \gamma_3 < y_i^* \leq \gamma_4 \\ 5 & \text{if } \gamma_4 < y_i^* \end{cases} \quad (3)$$

其中, y_i 是被调查者的主观满意度选择, 1~5 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五个层次, y_i^* 是消费者内心的潜在决定模型, γ_i 是预期临界值, 当 y_i^* 低于 γ_1 时, 被调查者主观表达为很不满意; 当高于 γ_1 , 低于 γ_2 时, 被调查者主观表达为不太满意; 由此可依次递推到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虽然无法确定定义其模型的形式, 但在大样本情况可以构建概率函数。当居民选择满意度为 1 时, 其潜在 y_i^* 低于临界值 γ_1 , 而 $y_i^* = f(h_i - e_i)$, 将函数简化为一次性, 那么 $y_i^* = h_i - e_i = \gamma_1$ 。所以, $h_i - \gamma_1$ 是预期的较好替代变量。进一步, 遵循理性预期的基本思想, 居民会基于一切信息集合做出预期判断, 预期判断是在自身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个体特征影响者预期判断值。而且周绍杰等 (2015) 也构造过个体特征与满意度之间的分析模型, 采用他们已经使用的模型, 使用自身幸福感、年龄、就业情况、收入水平、职业、教育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作为自变量, 把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数以及所在城市作为控制变量, 把民生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构造有序选择模型, 实证结果如表 8 所示, 临界值 γ_1 到 γ_4 分别为 -2.909、-1.319、0.993、2.742。相应地, 当满意度选择为 1, 预期为 $h_i - \gamma_1$; 当满意度选择为 2 时, 预期为 $h_i - (\gamma_1 + \gamma_2)/2$; 当满意度选择为 3 时, 预期为 $h_i - (\gamma_2 + \gamma_3)/2$; 当满意度选择为 4 时, 预期为 $h_i - (\gamma_3 + \gamma_4)/2$; 当满意度为 5 时, 预期为 $h_i - \gamma_4$ 。

表 8 满意度的临界值估计的基本情况

临界值	cut1	-2.909*** (-9.01)	cut2	-1.319*** (-4.81)	
	cut3	0.993*** (-3.48)		2.742*** (-9.99)	
N	4145				
Loglikelihood	-3197.5651				
Pseudo R ²	0.0426				

注: 同表 2。

(3) 模型估计与分析。将相关数据代入基本模型, 得到如表 9 的基本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 在控制模型中 (模型 1), 年龄、就业情况、收入、文化程度、自身生活满意度均对民生满意度有显著影响。随着主效应中民生获得感变量的加入, 模型的可决系数由 0.214 提高到 0.555 (模型 2)。且模型 1 中年龄、就业情况、收入、文化程度、自身生活满意度均对民生满意度影响程度开始减少或不显著, 这表明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 有一部分是通过民生获得感进而影响到民生满意度, 他们既直接影响民生满意度, 也影响民生获得感。随着预期的加入, 在模型 3 中, 控制变量只有年龄、收入以及自身满意度对民生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较模型 2 降低, 这表明它们既直接影响民生满意度, 也影响民生预期。最后, 加入调节变量后, 年龄、收入以及自身满意度对民生满意度变化并没有影响。而且, 在未加入调节变量之前, 民生获得感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 加入调节变量以后, 民生获得感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根据调节方程, 民生预期对民生获得感在民生满意度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民生预期越高, 获得感变化对满意度的影响就越弱。同时, 自身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 本文发现问卷中明确表示民生公共事务参与度低的人群的民生成效获得感为 3.322, 明显高于全样本均值

的3.216，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度低导致获得感强。可能的原因是，那些广泛参与民生公共事务中的人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获得感。

综合来看，年龄、收入、自身生活满意度既直接影响民生满意度，又影响民生获得感与民生预期，它们对民生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数、就业情况、职业、文化程度以及性别等因素未能对民生获得感、民生满意度与民生预期有同时的影响。此外，民生获得感对民生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作用，民生预期对民生满意度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且起调节作用：民生预期越高，获得感变化对满意度的影响就越弱。

表9 模型回归的基本结果

变 量	控制模型	主效应		中 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年龄	0.021***	0.017***	0.006*	0.005*	0.005*
居住环境	-0.002	-0.001	-0.006	-0.007	-0.007
家庭成员数	-0.007	-0.004	0.000	0.000	0.000
就业情况	0.023***	0.021**	0.008	0.008	0.008
收入	0.0415***	0.038***	0.015***	0.015***	0.015***
职业	0.005*	0.004	0.001	0.001	0.001
文化程度	-0.392***	-0.028***	-0.005	-0.006	-0.006
性别	0.015	0.011	0.000	0.093	0.000
所在城市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自身生活满意	0.248***	0.157***	0.06***	0.06***	0.058***
主效应					
民生获得感		0.206***	0.417***	0.443**	0.442***
民生预期			-0.353***	-0.327***	-0.327***
中介					
民生获得感×民生预期				-0.008**	-0.008**
民生获得感×自身生活满意度					0.001
R ²	0.214	0.555	0.761	0.761	0.837
F	112.8***	167.29***	1096.2***	1013.89***	941.25***

注：同表2。

(4) 稳健性检验。进一步，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采取替换检验方法（协方差分析）进行重新实证，予以相互印证，协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10。表10的结果显示，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如自身生活满意度、收入、民生预期、民生成效获得感以及预期与获得感的交互项的显著性都与表8一致，且整体贡献均为76%，可以认为表9所作检验具有稳健性。

表 10

利用协方差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来 源	第Ⅲ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检验
修正的模型	738.982***	17	43.47	779.79
截距	525.8***	1	525.8	9432.218
自身生活满意度	6.401***	1	6.401	114.82
年龄	0.133	1	0.133	2.385
居住环境	0.057	1	0.057	1.029
家庭成员数	0.002	1	0.002	0.029
就业情况	0.149	1	0.149	2.67
收入	1.323***	1	1.323	23.731
职业	0.014	1	0.014	0.26
教育程度	0.147	1	0.147	2.638
性别	5.23E—05	1	5.23E—05	0.001
所在城市	0.105	1	0.105	1.877
民生预期	29.438***	1	29.438	528.088
民生成效获得感	66.39***	5	13.278	238.19
预期×获得感	0.206*	1	0.206	3.688
错误	230.06	4127	0.056	
总计	37774.064	4145		
校正后总数	969.042	4144		
$R^2 = 0.763$ (调整的 $R^2 = 0.762$)				

注：同表 2。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指数与问卷调查，对我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指数进行了测量与差异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472，但两者的差异也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数值差异和特征差异两个方面。

第二，从数值差异方面看，2014 年民生获得感大于民生满意度 0.136。其中，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等值的数目为 101 个样本，仅占全样本数量的 2.3%，民生获得感大于民生满意度的数目为 2483 个样本，占全样本的 58.34%，民生获得感小于民生满意度的样本数占全样本的 39.36%。并且两者的正负等级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负平均等级分别为 2138.95 和 1987.48（根据 Wilcoxon 等级检验），民生获得感大于民生满意度的绝对值的均值是其小于民生满意度绝对值均值的 1.11 倍。

第三，从特征差异方面看，民生满意度在不同年龄、居住环境、就业状态、收入、文化程度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别，民生获得感只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别，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其中，年龄越大民生满意度越高，收入越高民生满意度越高；收入相对越高民生获得感也越高。同时，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正负值分布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维度，在文化程度维度有部分体现，年龄越大两者的差异值就越大，文化程度越高有

一定的差异减少趋势。

第四，导致数值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民生预期对民生满意度有直接负向影响，预期越高民生满意度就越低，并且预期还有负向中介调节作用：预期值越高，民生获得感提高对满意度的促进作用就越弱；造成两者特征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在个体特征因素中，年龄与收入是既能直接影响民生满意度，又能影响到民生获得感与预期的因素，其他个体因素则没有这样全面的影响。此外，居民的自身生活满意度也均影响到居民的民生满意度、获得感与预期。

因此，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背景下，上述研究发现对强化民生改善重要启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立足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有机协同，重视可控的共性因素。深刻把握收入与自身生活满意度在两者中的共性作用，把促进收入与提高居民自身生活满意度作为推动两者有机协同的重要措施。实施收入倍增工程，制定居民各类收入差别化增长政策，推进就业保障工程，对低收入人群实施“一户一策”的就业保障计划；推行“双创”互助机制，将“双创”平台和“双创”基金向创业大学生、创智青年和创新人才倾斜，以创业带就业、以创新来增加收入；开展全民职业价值提升计划，推出普惠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推动重点高校课程开放，建立周末与晚上的免费培训体系。开展大规模全民生活满意度大调查，切实找准人民群众生活满意的各类诉求；实施普惠与重点相结合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提升政策，以县（区）为单位，以各地人民群众最迫切生活满足为准绳，因地制宜，按照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实施一批生活满意度提升工程。

第二，深刻把握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在个性特征上的差异，强化民生获得感见实效，民生满意度重差别。民生获得感在个性特征上差别并不明显，强化获得感还是要多想实招、多出实策、增强实感。因此，针对民生获得感，要持续推出民生成效工程与落实民生实事，营造一种持续改善的状态氛围，让参与群众切实感受到改变。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主导、逐步推进、自选动作”的民生改善大竞赛，中央根据地方改造的投入与产生的社会效益确定补贴的比例和优先顺序，最高可实施全额补贴，并设立排名奖励，通过竞赛形式倡导各地民生工作的更好落实。针对民生满意度个性特征明显的特点，继续推进差别政策的实施，把重点人群、重点区域作为民生满意度提升的重点。

第三，加强民生工作改善中的预期管理，让民生改善切实转化为满意度。城乡居民过高的预期不利于民生满意度的提高，而过低的预期又不利于激发地方政府改善民生的动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预期是最合理的选择。而且，预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人民的预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趋势下，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的有机协同就更为重要。在措施上，采取引导、教育、宣传和直接参与等方式让本地居民形成合理民生预期；全方位公开各地民生成效工作的进展和困境，让居民有一个信息完备的社会比较集，形成较为客观的社会比较，协调民生预期与民生发展同步发展；创新民生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推进民生工作进基层、到身边，在基层个别民生热点问题上取得超预期的成效，“以点带面”促进民生满意度提高。

参 考 文 献

- [1] 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et al., 2009,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 (4): 387~405.

- [2]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J], *Human Relations*, 7 (7): 117~140.
- [3] Gurr T. R., 1970, *Why Men Rebel*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 Kahneman D., Deaton A., 2010,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38): 16489~16493.
- [5] Tsui A. S., Pearce J. L., Porter L. W., et al., 1997,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Does Investment in Employees Pay off?*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 (5): 1089~1121.
- [6]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民生发展指数总体设计框架》[J]，《改革》2011年第9期。
- [7] Claes Fornell、刘金兰：《顾客满意度与ACSI》[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 [8] 曹现强、李砾：《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
- [9] 陈世香、谢秋山：《居民个体生活水平变化与地方公共服务满意度》[J]，《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1期。
- [10] 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2011省级区域民生指标体系——京浙沪民生指数排名全国前三》[J]，《领导决策信息》2011年第17期。
- [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我国民生发展状况及民生主要诉求研究——“中国民生指数研究”综合报告》[J]，《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
-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中国民生调查2016综合研究报告——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民生关切》[J]，《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
- [13] 韩俊：《中国民生指数研究报告2014》[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 [14] 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
- [15] 黄艳敏、张文娟、赵娟霞：《实际获得、公平认知与居民获得感》[J]，《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11期。
- [16] 霍金斯、马瑟斯博：《消费者行为学（原书第12版）》[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 [17] 刘长庚、张磊：《新时代消费发展需推动消费量质齐升》[J]，《消费经济》2018年第4期。
- [18] 毛中根：《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8。
- [19] 课题组：《民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 [20] 任栋、夏怡凡、孙怡：《民生满意度指数研究——以四川民生满意度指数分析为例》[J]，《财经科学》2015年第2期。
- [21] 史耀疆、崔瑜：《公民公平观及其对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分析》[J]，《管理世界》2006年第10期。
- [22] 宋明顺、张霞、易荣华、朱婷婷：《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及应用》[J]，《经济学家》2015年第2期。
- [23] 唐有财、符平：《获得感、政治信任与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J]，《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 [24] 王斯敏、张进中：《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N]，《光明日报》2015年3月14日。
- [25]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
- [26]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民生指数研发中心：《中国省会城市民生满意度指数报告》[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The Sense of Gai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Measuring and Variance Analysis

Ye Xu Xie Chi Mao Zhonggen

(Institute of Consumer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Objectives: Measuring the sense of gai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nalyz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ces. **Research Methods:**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of sense of gain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search Findings:** First, it is of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nse of gain and satisfaction,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472.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also obvious. On numerical difference, the average sense of gain is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The sample number of the sense of gain is more than, equal to and less than satisfaction accounted for 58.34%, 2.3% and 39.36% of the total samples respectively. And it is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ades. In terms of feature differences, it is no obviously different in sense of gain of people's livelihood except for different wages and ages. But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not. Different groups of age, living environm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wage and education all pla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differences. Second,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lues is that people's livelihood expectation play direct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with a negative mediating effect. The higher the expected value, the better the sense of livelihood and the less the promotion of satisfaction. The reason for the age and income makes a difference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age and income could affect the sense of gai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 Innovations:**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differenc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gain sens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and reasons of their differences. **Research Value:** It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sense of gai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a better way, an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

Key Words: Sense of Gain of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Measuring; Variance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I39; D63

(责任编辑: 王喜峰)